

“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

——张元济在 1919

高永施

这一年，张元济 53 岁，距离他请夫人售卖首饰以入股商务已有 18 年。张元济在当年留下了 10 万字的工作日记，还有大量与各方往来的公私信件。本文将他在 1919 年中的一些经历及因由背景作片片剪影，尝试用这样的叙述还原纷繁交错的世界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展开。



美国农学家 W. T. Swingle (1871—1952)，足迹遍及地中海和亚洲地区，以柑橘分类法闻名

“父亲辛劳半世，乃得有一栖身之地”，张元济之子张树年这么记述 1913 年底建成，次年年初全家迁入极司非而路新居。后来我们知道，这辛劳确实只是过半，“从此以后更艰难”。张元济的一生中内战外患相继不绝，而这位清末翰林自戊戌后脱离政界，于离乱之世扶助文教事业，“不断扫腐儒之陈见”，“昌明教育平生愿”，未有懈怠。家人眼里的张元济“脾气急切”“精力充沛”。他全身心投入实业，侄孙女张祥保说，她见叔祖“写了不计其数的字”，但“从不在诗文创方面花费精力”。

1919 年，张元济 53 岁，在商务印书馆任经理。这一年，距离他请夫人售卖首饰以入股商务已有 18 年，印书馆的事业如平地楼台。张元济在当年留下了 10 万字的工作日记，还有大量与各方往来的公私信件。这些非公开性的文字记录下一个人在无数时刻和场景中的细节，穿梭其中，仿佛置身他宏富世界的密林。

本文将张元济在 1919 年的一些经历及因由背景作片片剪影，尝试用这样的叙述还原纷繁交错的世界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展开。读者会看到，张元济这一年的办刊、人材搜罗、商战、交友与古籍影印等诸项事务或受时代潮流冲刷，或随之起伏，而这位新旧之交的读书人屹立其间，支持着旧邦知新又温故。

正月初一的午餐

己未年正月初一的中午，张元济在一品香饭店宴请陈懋鼎（征字）、冯庆桂（千里）、夏元璠（浮筑），又有商务同僚王显华（仙华）、张世璠（叔良）陪坐，“惟施永高未到埠”。同座几位都是张元济的故交新知，但怎样的朋友会选在大年初一聚会呢？

陈懋鼎是张元济在清廷任官时的同僚，出身显赫，才华过人。甲午战后第三年，他们曾一起开办通艺学堂。这个学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专讲

泰西诸种实学”，学生“学习期满，著有成效，有官人员保加升阶，无官人员比照同文馆作为翻译官”。百日维新失败，学堂停办，张元济遭革职，而陈则逃过一劫，调入总理衙门。陈曾出使英国，精通英语，还第一个把《基督山伯爵》翻译成了中文，变成中国古典小说味十足的《岛雄记》。冯庆桂和夏元璠是比较年轻的海归博士，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夏曾于 1910 年张元济游欧时作陪同，这时他正待赴美考察，还在与张元济商量为《东方杂志》撰稿事宜。冯则与未能出席的施永高关系更密，在美国时曾是他的助手。

一桌人都通晓英语，张元济也不例外。他早年在京做官时开始与一班同道的青年官员学习英文。据侄孙女张祥保回忆，叔祖曾对人说他任刑部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外国电报，久而久之能解其内容。百日维新第二年，内藤湖南拜访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主持编译事务的张元济，看到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放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墙上挂着各种英文科学挂图。茅盾则说起他第一次到商务印书馆求职时，就见到张在电话里“用很流利的英语和对方谈话”。

要在大年初一专凑一桌有欧美背景的朋友在中餐馆吃饭，大概本来是是为让“能识汉字而不能操华语”，“酷嗜吾国旧书，于版本亦颇有经验”的美国

人施永高 (W. T. Swingle) 感受一下最正宗的中国春节。

施永高是一位农学家，当时致力于搜集中国的植物资料，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名义在中国采买载有植物信息的中国文献，尤其是各地方志，又兼为其他美国机构购书。张元济也长年与商务印书馆搜购书籍，既为馆内人员工作参考，也为影印古籍之便，到 1909 年时他一手打造的图书室以“涵芬楼”命名，后来又并入商务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这样来看，施永高算是张元济半个同行。而且张元济为商务购书，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地方志，这构成东方图书馆藏书的一大亮点。后来张元济回忆，民国之初市场上的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十百者”。在市书还笼罩在传统目录学评价体系和善本赏鉴风气里的年代，方志不是抢手货，施氏来华采购不为求珍求异，而为了解各地自然环境与植物，张元济看待这位外国同好的心态，就不会像对那些财大气粗又专盯善本的日本人那样感觉有竞争和威胁，而更多了相惜相知。

去年 9 月施氏夫妇来到上海，张元济带他到涵芬楼看书，“甚为欣快”，还在寓所宴请他们夫妇。张元济对施的购书任务非常热心，除了把他介绍给傅增湘，还致信各大书店，又嘱商务的北京分馆诸多照应，甚至包括垫付书款、装箱运输等事。他们约定，今年 1 月左右施

永高南返上海时会开出一张所需方志的清单，以便将来商务印书馆继续代为采办。这大概就是己未年初一聚会的缘起。不巧的是，施的行程耽搁，2 月 1 日这一天没能抵达上海。张元济日记记“二月（引案：似是“二日”的笔误）施永高来，交到志书目录一册，又托速办《图书集成》及《图绘宝鉴》，又属代办中国笔墨纸”。

从初一到初四，张元济的工作日记停记 4 天，象征过节。初五日记的天头写道“阴历新年假满，本日办事”。

出版内容的革新

办刊的假想敌

已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十四年的《东方杂志》，在 1918 年遭受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质问。但这一年底的日记里，张元济并未提及那来势汹汹的一方，倒记下了另外两个假想敌：

昨与梦（高梦旦）、仙（王仙华）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价，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应斟酌。

《青年进步》同样立足上海，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自然是《东方杂志》的老对手。《新潮》创刊号的正式出版则在 1919 年 1 月，由北大

学生自办。在它朝气蓬勃的学生背后是一众新派北大教授。《新潮》创刊号上有罗家伦的一枚“大炮”，题目亦即其批判对象：“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在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由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发展而来、当时占主旋律地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无思想”，也指名提出“登这派小说的《小说月报》等机关也要留意才好”，《小说月报》即属商务印书馆旗下。

四个月后，《新潮》又发表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小说月报》以外的商务主要杂志都被点名，《东方杂志》被批评为：

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认为这样毫无主张的杂志无法影响社会，传播新知，他“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

“京师为人材渊藪”

此时的张元济急切希望能在北京的学术界内发掘更多有新知识的人才，推动商务在出版内容上的进步。他有意聘请胡适来主持编译所，4 月托陈筱庄（宝泉）发出邀请，月薪 300 元。于是 5 月 1 日胡适、蒋梦麟与老师杜威来访商务时，

(下转 6 版) ➔



张元济 1898 年 8 月 15 日致沈曾植长信，记录窥见光绪的情形，他关于维新的建议与忧虑等 上海图书馆藏